

难忘的岁月

何長工





难忘的岁月

何长工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墨谷

难忘的岁月

何长工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27,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11001·488 定价 0.59元

前 言

《难忘的岁月》，共有十六篇回忆文章，其中有的是从前发表过的，大部分篇章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新写作的，记述了我从参加革命到抗日战争结束前这段时间的某些斗争片断。

我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麾前的一名老兵，也是现今屈指可数的大革命时期的幸存者之一。回忆往事，虽费心思，但倍感亲切，精神却是愉快的。目的有二：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激烈的社会变革时代，充满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时代证明了真理。作为一名老兵和幸存者，为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画卷增添一笔一划，使年青一代了解过去，不忘记过去，接好革命班，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第二，我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但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征途中，我还是有一番雄心的，力争当一名合格的新兵。回首往昔的火热斗争岁月，重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和许多老战友的期望，总结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可以砥励自己不敢稍懈斗志，“体虽残而心不残，人虽老而志尤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除此之外，这些回忆文章，若能为研究我党我军早期的斗争历史提供一点参考材料，那就更使我感到高兴了。

由于年迈，时间久远，事过境迁，文章难免有缺点、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适在党的六十周年时全部脱稿，就作为我献给党的六十大寿的一件小小礼品吧！

参加本书文字整理工作的有康景海、苏士甲、单继友、张文忠等同志。

何长工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目 录

走向新的生活	(1)
勤工俭学在法国	(9)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24)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	(34)
伟大的会师	(43)
改造王佐部队	(53)
“双枪兵”的变化	(64)
保卫井冈山的战斗	(70)
开辟鄂东南	(79)
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	(98)
峡江会议前后	(112)
红校和红大	(118)
粤赣风云	(126)
长征中的红九军团	(134)
毛主席要我办荣军教导院	(150)
抗大岁月	(155)

走向新的生活

和工人阶级在一起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民族灾祸和阶级苦难日益深重。一些受到西方思潮——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大都苦心焦思，希望能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改革社会，振兴中华。这时，恰巧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在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动员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这一倡导，得到了这些青年的热烈响应。特别是其中一些已初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分子，认为到欧洲去更便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因此，在湖南、四川、广东、北京等地，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加这一运动。

我是湖南华容县的一个贫苦学生。眼见中国的孱弱地位和腐败政治，早就立志发愤读书，学好本领，以便将来干一番自强救国的事业。一九一八年，我的家乡被洪水淹没，家境一贫如洗，无法供我继续升学。于是，我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谋出路。先是打算到南洋去做工的，后打听到蔡元培先生等在北京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我们便改变计划，赶赴北京，进入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这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之一，是勤工俭学总会在一部分社会进步力量的推动和支持下，通过蔡元培和长辛店铁路工厂接洽开办的。我们是半工半读，一边紧张地进行出国前学业上的准备，一边在铁路工厂做工自给。初到北京，吃住

困难，便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大伙儿分了工，买菜、做饭、洗衣服，一切都是自己来做。我分工管扫地、糊窗户、打杂。那时我们经常身无分文，有时吃饭都靠赊欠维持；下雪天，大家连棉衣都穿不上，临时派人穿着夹衣上北京城里借钱去买棉花作棉衣。

我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欲望却非常强烈，都如饥似渴地希望多学到一点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只要手头有一点钱，便用来订阅书报、杂志，争相阅读讨论。由于我们订阅报刊多，长辛店邮局的人都说：“需要专门派一个人给你们送书报、送东西才行。”当时北京、湖南和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象《新青年》、《湘江评论》、《国民杂志》、《每周评论》、《晨报》等，差不多我们班里都有。那上面发表的文章，象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有较深刻的印象。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毛泽东同志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开始提出以人民群众的大联合来反对反革命联盟的思想。《新青年》上，还系统介绍过《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的传略等革命理论文章。这些，对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开阔视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工厂半工半读，脱下知识分子的长衫，穿起了工人的衣服，和工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这样，便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近代工业的劳动锻炼和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熏陶。长辛店的工人阶级从爱国热情出发，对我们这些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勉工作，奋勉学习，准备远渡重洋，寻求救国道路的青年人，百倍地爱护，并寄予无限的期望。还记得我们那钳工师傅，叫陶善和，技术很高，他拿来圆钢，要我们锉成圆形

或方形，锉完了，他就把工件放在抹了油的平面样板上检验，如果有的地方没粘上油，那就是没有锉平，还得锉。他很严格，一点不放松。老师傅费了苦心来教我们，把自己的全部本领拿出来，唯恐我们学不会，希望我们在国外勤工俭学中，有独立谋生的本领，可以多求得些革命救国的办法。我们也利用业余时间，每周三次，轮流教工人们学文化，讲国内外大事与爱国反帝、劳工神圣的伟大意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我们还关心工人的生活疾苦，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有一个时候，长辛店鼠疫流行，恶性传染，市民及工厂职工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反动当局也不采取救治措施，我们便不顾一切，冒着被传染与丧失生命的危险去给职工宿舍和市镇消毒，给病患者医疗抢救。

学生与工人的这种密切结合，是一种创举。当时这样做的知识青年，虽然人数还不多，但以后革命的实践证明：这是时代的要求，青年运动的新方向，没有任何反动势力可以阻止它。我们当时置亲友的各种非议于不顾，都很自豪地说：“吴秀才（军阀吴佩孚字子玉，从前是个秀才）投笔从戎当了大帅，在这个社会上传为美谈。其实不过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增加一个灾星而已。而我们投笔从工，从生产的观点来衡量，可胜过吴子玉多多了。”吴佩孚怎么能同我们比呢？

难忘的印象

我们在长辛店预备班半工半读期间，毛泽东同志也在北京。他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热情鼓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两次来到长辛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冬。这天上午，毛泽东同志先到工厂调查了解情况，和厂方交涉增加预备班学生的事，下午就到预备班

看望我们，了解学习做工进度，晚上就住在我们的宿舍。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坐在土炕上，详细地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详细地了解了我们和工人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这是出国的第一课。在国内养成工读习惯，到了国外才能和法国工人结合，和斗争实践结合。当毛泽东同志知道我们同工人的关系融洽，不单学到了技术，而且学到了工人们的爱团结、守纪律的好品质时，显得格外高兴。他还同我们讲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发动民众而失败的历史教训，鼓励我们继续深入群众同工人做朋友。他还讲了同工人做朋友两个条件，第一，真心实意地去关心工人，不鄙视他们；第二，熟悉工人的生活、思想，特别是学习工人的语言，不要出口“之乎者也”。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联络工人，注意工人运动，启发工人爱国心，这是一门没有上书的学问，学好这门功课，出国用得着，回国更有用。知识分子只有同工人联结在一起才能有作为，救中国。当谈到学习时，毛泽东同志问我们湖南人学法文会不会正确发音，问大家会不会发卷舌音，并教我们怎样卷舌发音，同时，建议我们学点音韵学。我在预备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关照和我同班的老大哥们照顾好我。当毛泽东同志了解到我们都为出国路费发愁时，他安慰大家说：大家安心学习，路费一定千方百计为大家筹办。后来毛泽东同志等多方运筹，解决了路费问题，大家才得以顺利出国。

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长辛店，是在一九一九年春，永定河里的冰刚刚解冻，北方的寒冷还威胁着我们南方人。有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还是先到铁路工人中间做完了事情，然后才回到我们班上来的。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他那天晚上坐在炕上，纵谈天下大势；他的远见卓识和革命气概，深深激动着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

战斗的洗礼

五四运动爆发前，我们在长辛店已经听到卖国政府准备向帝国主义屈膝的消息。北京大学的学生早就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留法预备班北京班和保定班也和我们互通消息，我们班也常派人到沙滩马神庙附近（那儿是北大的斋舍）去写标语。

五月四日，以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分赃会议上签字出卖山东权利为导火线，一个带着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更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天，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们怕乘火车不能如时赶到，便都骑着毛驴赶赴北京城；那时自行车是有钱人骑的，我们谁也买不起自行车。到了天安门，见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开完大会，游行队伍一起前往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不料遭到大批反动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刺死、打伤、逮捕。军阀政府这种反动行为，更加激怒了群众，大家立即采取行动，去反击卖国贼和反动派。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们，分成了三路向反动派进攻：一路到赵家楼去打曹汝霖；一路去到东交民巷，包围日本领事馆；一路去打德国牌坊（就是清朝卖国政府为义和团所打死的德国人克林德立的纪念碑，我们叫它“国耻纪念碑”）。我们长辛店学生参加的是东交民巷一路。事后听说，去打曹汝霖的一路，没有捉到曹汝霖，便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还把没来得及逃跑、躲在曹家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北洋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住我们，反而更加激发了群众斗争浪潮。五四运动向着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第二天，北京市学生总罢课，展开了救国的宣传活动。当时成立了“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等组织，到处演说，鼓动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在长辛店，我们也

同样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到工厂车间向工人宣传，到车站向旅客宣传，到近郊向农民宣传。工人们都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厂里的工程师、技师大多数也同情和支持我们。老师傅陶善和说：“开初，我把你们当成啥也不懂的毛孩子，谁知道，你们竟敢上北京去闹总统府。”后来我们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在长辛店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加下，迅速扩大起来，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其中工人团员有五百余人。

铁路工厂当时有个副厂长叫刘家骥，猖狂反对我们进行爱国活动。他是曹汝霖的女婿，和卖国贼一个鼻孔出气。他曾召集我们开会，辱骂我们说：“你们这些穷小子，爱什么国呀！不好好读书，光会闹事。你们真是劣马害群，再闹我要开除你们！”我们火了，要揍他，他看风头不对，赶忙逃跑。厂里工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击卖国贼爪牙对我们爱国活动的污蔑和破坏。五月七日，厂里工人罢工了。我们和工人商量好，去烧刘家骥的房子惩罚他。于是，有些工人就和我们一块儿拿着做工用的钳子、大锤，抬着洋油桶，直奔刘家住宅，一同去的还有厂里的工程师和我们的教员。刘家骥早已闻讯吓跑了，只剩他老婆在家，门关得死死的，怎么叫门她也不开。工人和我们一边向墙里扔石头，一边把洋油往门上一倒，点起火就烧了起来。大伙儿爬上了围墙，他老婆穿着西装裙子，站在凉台上，吓得卜通一声，跪了下来，哀求说：“各位同学先生们！工友们！他人走了，得罪你们了……不要吓坏了孩子，我给你们赔罪……”最后还是我们预备班一位法文教员出来劝止，我们才和工人一同散去。

我们惩罚了一下刘家骥，工厂的头头们的威风 and 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不少。工人抬头了，从政治上争取到了一些民主权利，可以自由地参加爱国活动了。从经济上，争取到一些福利，工人向工厂借工资，也较以前放宽。厂里的办事人员对工人的态度也比前

变得温和一些了。

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经过这一场斗争，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都有了提高，也为以后的“二·七”罢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与工人阶级共同生活、共同斗争的紧密结合里，已经切身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与智慧。如果不依靠工人，“五四”前后我们在长辛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种崭新的体会与认识，立刻化为我们的行动。在“五四”的群众运动高潮过去后，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在工农群众中的活动，主要是搞宣传。差不多有两个月，我们没有上课，也没有做工，打着长辛店救国宣传队的旗子，三、五个人一组，到车间或下乡去作宣传工作。每天带上几个窝窝头，早出晚归，一天要跑几十里路，到处向工人、农民演说，宣传爱国反帝，劝老百姓抵制日货，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工农群众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呼叫国家到了危亡地步，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阶级仇恨。

当时，有些北洋军阀办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野外演习，驻扎在长辛店，我们也抓紧机会向他们宣传，对他们讲不要打内战，不要为军阀当炮灰，杀自己的同胞。这些军校学生，本来看我们读书又做工，每月还有几块钱花，还可放洋留学，就有些羡慕。经过大家的宣传，有的就跟我们商量：“你们中学毕业当工人，我们当丘八，能不能让我们也进来？”

五四运动从学生的游行示威开始，很快获得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六、七万工人首先发动了大罢工，接着沪宁、沪杭两铁路工人罢工，长辛店的工人也相继而起，罢工示威的浪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政治斗争即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使五四运动规模更加宏大，波澜更加壮阔。在这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反动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去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几个大卖国贼的官职，恢复了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给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生动的阶级教育。当时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并逐步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中宣告结束，而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宣告开始了。

* * *

从一九一八年秋天到一九一九年冬天，在这短短可贵的一年多光阴中，我们和工人同志们，亲密无间地相处。至今想起来仍不禁心情激动的是：出国前夕，工人们给我们组织欢送会，与在车站临别的刹那间，欢呼声与东去列车的轰鸣相呼应，那种难分难舍的情景。当时工人生活是很苦的，但是，他们情愿请假，牺牲一天，不做工，不拿钱，也要为我们饯行。他们象过节一般，打扫擦洗，悬灯结彩，张贴标语口号，烧茶水，作点心。所花经费，都是他们自己掏腰包凑集起来的。

在欢送会上，大家放开喉咙唱着民歌、京剧，拉着二胡，歌声嘹亮，热情奔腾，充满了工人阶级大家庭的友爱与温暖。会上，学生和工人互相鼓舞，祝愿我们祖国与工人阶级光明的未来，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到我们临走的时候，工友和他们的家属表露出送别亲人一样的感情，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手握手，肩并着肩，来到长辛店车站，目送我们登上了列车。列车启动了，汽笛发出了震人心弦的吼声，我们隔窗互相凝视着，不禁眼圈发红，热泪迸流。我们暗中宣誓：“师傅们！我们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为祖国找出一条出路，才有面目回来见你们。”

勤工俭学在法国

初到巴黎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开始分批由上海出发，飘洋过海，前往法国。我们是乘法国“布尔列加”号邮船动身的，因船票很贵，只能坐四等舱。舱内空气混浊，特别是当海轮航行在赤道线上时，闷热得令人难忍。许多学生都是初次航海，刮大风的时候，就躲到舱里，饱受眩晕呕吐之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之后，才抵达目的地——法国马赛港。出面接待中国学生的中国驻马赛领事，竟是一个法国人。学生们一看就凉了半截。这位“中国领事”，就连中国话也听不懂。事后得知，这种任用洋人充当中国领事的有损国家独立尊严的事，在驻美、驻英等领事馆中也同样存在。所以，当学生们一到法国，就觉得举目无亲，都有一种海外孤儿的感觉。

在我们来到的时候，留法勤工俭学生已经有三百多人了。一部分在巴黎，一部分已经分散到外地。战后法国的社会生活还没有恢复正轨。很多工厂开不了工，工人失业的很多。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部分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进学校，许多学生就住在华法教育会里面。华法教育会的房子住满了，就在花园里搭帐篷住。华法教育会每月发给学生少许生活补助费。

刚到巴黎，我们就买了旅行指南，迫不及待地去观赏闻名已久的巴黎风光。我们特别观赏了世界有名的巴黎铁塔、卢夫尔宫和巴

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凡尔赛宫象是座落在一座小山上，是以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而出名的。我们从大理石的台阶拾级而上，一进宫，导游人首先带我们参观欧战和约签字的会议厅。大厅是圆形的，比地面低，象我国旧戏院的池子。走到签字的地方，导游人指着席位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威尔逊坐在什么地方，中国代表坐在什么地方。我们听着，不禁又想起五四运动中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情景。在拿破伦宫的一个陈列馆里，我们看见里面有我国古代的各种袍服、盔甲、军衣、铜炮、宝塔、宝剑等。这都是法帝国主义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证。可是，不少法国的达官贵人在参观时却振振有词，把这种强盗行为，说成是正义行动，说什么中国人野蛮，应该给予惩罚。帝国主义分子这种颠倒黑白的无耻澜言，使我们非常愤恨。参观回来，我们都不禁满怀爱国激情地仰天呼唤起来，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振奋起来？被人欺凌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巴黎表面上很繁华，看不出战争的痕迹，但是生活中还留下战争的影响，物价平均比战前涨了三倍。法国人民一买东西就说：“这都是德国强盗害的。”人民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痛骂德国人。认为挤电车、排队买粮食，都是德国人造成的。法国人民也痛恨他们的总统，说总统是猪猡，吸人民血汗的家伙。有个老头喝醉了酒，当众骂总统说：“你死吧，有了你，我就活不了！”巴黎近郊，贫民窟比比皆是。人们有的住在破汽车棚里，有的住在用烂铁皮搭的房子里，到处晒着破烂的衣服，小孩在垃圾堆上觅食，苦工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勤以做工 俭以求学

到达法国后，勤工俭学学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工作。

有了工作，才有着落，才有可能省下钱来上学。但是，当时法国本国失业工人就有几十万人。我们这些新来的外国人，要在法国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起初我们只得天天去揽零活。有时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有时到火车站和轮船码头搬运东西；有时到建筑工地当小工，拌水泥，拣石子，或是到大街去清垃圾，到饭馆当跑堂、削土豆皮等。临时工生活很苦，法国人叫“马来夫尔”，我们就叫它“马老五”，意思是苦力，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整天辛勤所得，也仅够糊口而已。在法国，虽然有一个“华法教育会”的机构，负责照管勤工俭学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但它是一个官僚机构，对学生的事情很少过问。勤工俭学学生互相帮助，经过重重困难，直到一九二〇年十月，才陆续找到工作。

我的工作是在巴黎近郊的比昂古尔区的“雷诺”汽车分厂。这是个工厂，全厂有一万多工人。赵世炎、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同志都在这个工厂做过工。后来，周恩来同志也到了这里。由于工厂分工较细，大家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每当节假日勤工俭学学生集会时，还是能够见面的，有时还能听到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他们同国家主义派的辩论演说。我们不少人从“实业救国”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赵世炎同志、蔡和森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的宣传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应该说是我们转变思想的“启蒙老师”。

法国工人对我们特别的关心，许多青年工人，更是热情、主动地接近我们，教我们说法国话，关心我们的生活。如果发现我们不高兴，就跑过来问长问短：“你在想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一次我上工迟到了，没拿到工牌，按照厂规，迟到一分钟，就不发给工牌，没有工牌就上不了工，拿不到工钱。我正在为难的时候，被一个法国青年工人看见了，他把我拉去找工头说：“给他一个牌子吧，他不过只迟到一分钟。他今天上不了工，就没法生活了。再说，他这样的